



陆杰森 “薯条哥”感动中国

最近,一位外国男青年与一位中国乞丐老奶奶共同分享快餐的照片,被众多微博网友争相转发。照片由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名学生随手抓拍,他当时路过学校附近的一家快餐店,正好看到那名老外分了一包自己买的薯条给门口的乞丐,过了一会他还低身向老奶奶捡拾的饮料瓶里倒了点矿泉水。如此温馨有爱的场景,让网友深受感动,纷纷称他为“薯条哥”。

媒体迅速搜寻到了这位“洋雷锋”的信息:他是美国洛杉矶人,中文名叫陆杰森,今年23岁,毕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,去年9月来到南京大学参加“中文领航项目”,目前在南京一家运动品牌公司实习。陆杰森表示,自己给那位老奶奶买薯条也是凑巧的事,当时自己正从珠江路往广州路走,突然看见快餐店门口坐着一位赤脚乞丐老人,怜悯之情油然而生,于是买了两份薯条,坐下来和她边吃边聊。

这并不是陆杰森第一次和乞丐一起吃东西——他曾给乞丐的老大爷送过果汁,还陪其他乞丐吃过饭。“我是很幸运的人,每天有饭吃、有地方住、有好的工作机会和家庭,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,他们也许生来条件就不好,也许长大后做错事,但他们现在的生活艰难,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给予帮助。”陆杰森对自己的走红感到很意外:“我只是给了她一些对于老年人来说不算健康的食物,并且跟她聊了几分钟,我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新闻价值。”

然而,正是这样一件当事人觉得稀松平常的事,却在中国网友中收获了无数感动,这足以说明当前社会的道德饥渴已经何其严重。乞丐是我们的同胞,但多少中国人却完全漠视他们的存在,甚至在潜意识里将他们等同于骗子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不仅有人嘲笑陆杰森“太过天真,不懂江湖险恶”,还有一些人怀疑这位心存善念的外国年轻人于行乞者一起吃快餐是“炒作”。与心思简单的“洋雷锋”相比,那些“聪明”的中国人应觉得自惭形秽。



黄红 国考因“内向”遭拒

27岁的黄红怎么也不会想到,中国保监会青海监管局人事处一个蹊跷的电话,会让她的公务员之梦瞬间化为泡影。这位中国人民大学保险专业的毕业生,历时4个多月先后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、专业考试、面试和体检,在所有竞争者中总成绩排名第一。然而,正当她满心欢喜准备上岗时,却被招录单位告知:因岗位匹配度不够而取消录用,理由是性格内向。

在黄红的描述中,整个招录过程疑点重重。与她一样在最后关头被取消录用资格的,还有成绩排名第二和第三的郭华东和岳太杉——前者遭拒的理由是“协调能力弱,岗位匹配度不够”,后者遭拒的理由是“年龄太小,岗位匹配度不够”。事实上,如果不是后来自己亲赴西宁复检,他们三人可能早在体检环节就已折戟——今年3月初,他们分别被接到电话通知:黄红体检初检结果显示转氨酶高,郭华东血小板异常,岳太杉血压偏高。

在公务员考试频现“萝卜招聘”的语境下,黄红他们所遭遇的“巧合”和“波折”,很容易引发外界联想。语焉不详的“岗位匹配度”的标准如何界定,考生们事先并不知情,招录启事中也并未做出说明,显然不应在最后环节成为拒录某名考生的核心理由。然而,面对质疑,青海保监局既不肯向当事人出具书面证明,又以保密原则为由拒绝接受媒体监督,更让这起招录事件有了几分欲盖弥彰的色彩。

黄红因“性格内向”而止步公务员大门之外,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湖南公务员考试中要求“乳房对称无包块”的荒唐要求。公务员岗位的含金量如今越来越高,引得每年都有数百万考生报名参加,但越是这种油水丰厚的领域,各种潜规则和暗箱操作越是盛行。无论是以荒唐理由排挤考生,还是对各方质疑视而不见,无疑都是在自毁城墙。这种不透明、不公开的招录机制每多制造出一个意外出局的“黄红”,离它的公信力完全破产也就更近了一步。



杨玉龙 戴学士帽卖煎饼

在山东泰安城区街头,每天都能看到一位头戴学士帽、脚踏三轮车,沿街高声叫卖“本科生煎饼”的小摊贩。这位被网友封为“煎饼哥”的年轻人名叫杨玉龙,来自“中国煎饼第一镇”泰安楼德镇,2009年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数码设计专业。他曾在大学里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干部,并多次在广告大赛中获奖,但他现在每天所做的事,除了卖煎饼就是躲避城管。

杨玉龙曾为考取一所理想的大学而复读多年,这使得他比班上同学要老成许多。考上大学之后,他曾如其父母所盼,将户口迁出农村,但这种荣耀并未持续太久。在他本科毕业后的两年里,这个年轻人曾辗转北京、上海等地,先后从事多份与专业完全无关且待遇极其微薄的工作,身体也每况愈下。最终,备尝工作与生活的艰辛的他,只能无奈地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到山东,成为街头一个叫卖煎饼的摊贩。

媒体报道“煎饼哥”的事件之后,有些人将他与十几年前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做比较,其实他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。当年,陆步轩放弃令人羡慕的公职,开设“眼镜肉店”是一种主动选择,这也使得他在机遇与环境俱佳的条件下实现了个人梦想,成为年营业额过亿的连锁店老板;如今,本科毕业的杨玉龙“沦落”街头,可以说完全是迫于无奈,是残酷的就业现实让他走投无路之后做出的被动选择。

别说像陆步轩那样实现个人理想,卖煎饼的杨玉龙想要家人过得体面一些,都近乎一种奢望——即便他将自己的那顶学士帽戴烂,即便他将自己所有的证书都印在三轮车上,这种费尽心思的“营销”,仍不可能为他带来长久的收益。从理想的云端跌回现实,进入灰头土脸的行列,杨玉龙的那句“现在不谈什么理想了,首先得活着”让人感慨万端,而他其实只是目前众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的一个悲辛样本。



刘德山 法院院长遭逼供

近日,原河南省平舆县法院院长刘德山向媒体讲述了自己从被调查、逮捕、起诉以及无罪释放的特殊经历。在长达19个月的时间里,自认为对刑事法律规定和原则还算熟悉的刘德山,几乎遭遇了所有刑事诉讼程序现实问题——无法判定性质的调查程序、违反常态的监视居住、刑讯逼供、残酷看守所、“配合”法官判案。最终被判无罪释放之后,刘德山对自己难以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的经历唏嘘不已,感叹基层老百姓可能更难。

刘德山卷入的这场风暴,发端于毗邻驻马店的河南南阳。他曾经给予减刑的当事人白玉岗出狱5年之后,被指控为涉黑组织头目,案由公安部挂牌督办,要求严查案件背后的“保护伞”。公安部和中央综治办主要领导批示,河南省政法委组成专案组,在“上级高度重视”之下,刘德山和当年的另一位合议庭成员、驻马店市监狱有关人员、南阳市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,均被调查。一场历时19个月的特殊司法体验,由此拉开帷幕。

检方起诉时认为,时任刑庭法官刘德山在为白玉岗减刑时,违反了河南省政法系统的内部文件——“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”,属于玩忽职守。刘德山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,当年的审理完全符合刑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减刑案件审理的司法解释,但有关方面却点名要求他“检举内幕”。审讯期间,刘德山被连续21天不让睡觉,肋骨被打断,还遭遇了老虎凳、“挂起来”、“弓起来”、“擦起来”等多种刑讯逼供手段。

好在这位投身司法界整整30年的老院长没有污点可查,再加上多少懂得一些自我保护的经验,最终才等到了重见天日的一天。如他所说,他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追求司法公正,但他所看到的一些现实对他的信仰打了严重的折扣,“尤其是有的司法机关,根本不是在依法办案”。从刑讯逼供中生存下来的刘德山,或许可以考虑将自己这19个月的奇特遭遇,写成一本书,以此见证这个时代一些不堪的现实。



王旭 “旭日阳刚”成员进政协

5月6日至8日,曾因翻唱《春天里》而走红的“旭日阳刚”成员王旭,出现在河南省商丘市体育馆,参加政协第四届商丘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。作为一名文艺界委员,如今衣着光鲜的王旭,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光着膀子的农民工形象。他作为河南省商丘市新一届政协委员,不仅在会场上积极参与会议讨论,在场外也成了其他委员慕名要求合影的明星人物。

王旭并非第一位进入地方政协的娱乐明星。在此之前,同样身为草根明星的演员王宝强,就当上了河北邢台市政协委员;前不久,因央视选秀节目而走红的“大衣哥”朱之文,在登上今年春晚舞台后,也被菏泽市推选为政协委员。虽然此前有不少担任代表委员的娱乐明星饱受各方质疑,但这几位出身基层的委员,对农民和农民工有很深的情感,对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感同身受,仍然值得期待。

在商丘民权县生活了30多年的王旭,就很重视政协委员这个荣誉。为了准时出席家乡“两会”,他这次是专程从外地的拍摄现场连夜赶回来的。“当上政协委员,从今往后我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,需要更加谨慎,小心说话,除此之外,必须要担负起责任,我得为民办事。”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没有提交提案,但从王旭这番质朴的“履职感言”中,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位基层委员的诚意。

与其他那些娱乐明星不同,娱乐圈的“酱缸文化”对这样一位看上去有些“土”的明星,负面影响并不十分显著,这让他能够更好地保持可贵的底层本色,也让他通过政协这个平台给弱势群体“代言”打下了基础。被推选为政协委员之后,王旭仍不忘提醒自己,身后有一个庞大的民工团体,并表示会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帮助他们。凭着这份感恩之心和责任意识,我们都应该对王旭报以期待的掌声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

汤嘉琛

(时事评论员,专栏作家)